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3005

卢卡奇物化理论中的新康德主义因素

罗伯中, 张丽云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碧泉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不仅蕴含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思想因素, 更呈现出鲜明的新康德主义倾向。韦伯和西美尔的新康德主义思想是卢卡奇物化理论形成的决定性前见和问题域, 而非学界通常所认为的, 其仅仅是卢卡奇思想背景之一。卢卡奇借助新康德主义的意识和文化分析, 利用阶级意识概念重新整合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与马克思的历史观, 摆脱了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经济决定论, 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了新的理论路径。

关键词: 卢卡奇; 新康德主义; 物化; 西美尔; 韦伯; 黑格尔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6)03-0038-09

The Neo-Kantian Influences in Lukács's Theory of Reification

LUO Bozhong, ZHANG Liyu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nd Culture/Biquan Academy,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Lukács's theory of reification not only incorporates elements of Marxism and Hegelianism but also exhibits a distinct Neo-Kantian orientation. The Neo-Kantian thought of Webster and Simmel constitutes not merely a background influence—as commonly assumed in the literature—but a decisive presupposition and problematic for the formation of Lukács's theory of reification. Drawing on Neo-Kantian analyses of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Lukács redeployed the concept of class consciousness to reintegrate Hegel's concept of dialectics with Marx's view of history. This not only liberated Marxism from the mechanical economic determin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period but also opened up a new theoretical pathway for Western Marxism.

Keywords: Lukács; Neo-Kantianism; reification; Georg Simmel; Max Weber; Hegelianism; Marxism

卢卡奇从其物化理论出发, 依托总体辩证法的框架, 提出了以无产阶级意识对抗资本主义物化的方案。这一思路仿佛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植入了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社会分析语境中, 这也使得其思想常被冠以“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这一界定尽管正确地看到了黑格尔和马克

思在卢卡奇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 但其标签化的倾向容易遮蔽卢卡奇物化理论中蕴含的新康德主义因素。尽管有部分学者觉察到新康德主义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影响^[1], 也有学者注意到其理论经历了从新康德主义到黑格尔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2], 但他们大多将新康德主义的影

收稿日期: 2025-12-09

作者简介: 罗伯中, 男, 湖南宁乡人, 湘潭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响视为卢卡奇思想渊源中诸多可有可无的因素之一。这些学者对新康德主义在卢卡奇早期思想中的意义仅作简要提及, 更未能认识到康德主义的影响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正是它引导卢卡奇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物化理论推向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层面。在卢卡奇的思想体系中, 新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思想不断交融渗透, 在这三种因素中, 新康德主义是后两者能够实现结合的前见和问题域。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发展历经两个阶段: 一是早期艺术审美理论阶段, 以 1910 年的《心灵与形式》和 1911 年的《现代戏剧发展史》为代表^{[3]19-25}; 二是《历史与阶级意识》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物化思想都与新康德主义密切相关。本文将以西美尔和韦伯的思想为中心, 探讨新康德主义作为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前见和问题域。本文首先梳理卢卡奇早期艺术审美阶段的物化理论中狄尔泰、西美尔和韦伯的影响; 继而剖析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物化理论中的西美尔和韦伯的合理化原则因素; 最后重新审视学界关于新康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卢卡奇物化理论中的种种观点, 确证新康德主义是卢卡奇物化理论有别于马克思主义主流理论的关键。

一、卢卡奇早期艺术审美阶段的物化思想及其与新康德主义的关系

卢卡奇早期艺术审美阶段的物化理论, 集中体现为他的“生命的客观化”观念。他曾指出现代分工的一个基本方面可能就是使工作不再依赖于工人非理性的、并因此只能定性界定的能力, 而是依赖于与外在于个体工人并与他的个性没有关联的功能相关的客观因素^{[4]146-147}。这揭示了现代分工导致劳动过程本身与工人内在个性相剥离(物化), 工人无法在劳动中实现个体性, 只能在工作之外寻找其实现的途径。尽管新的价值随之出现, 但它们是以物化的形式存在, 个人依赖于非个人化的、僵化的机制, 这种机制的复杂性使得个人难以理解其功能, 这又进一步加深了物化程度。

卢卡奇上述“生命的客观化”思想无疑源于新康德主义者。卢卡奇在其自传中曾提及: “我在布达佩斯大学期间, 由于那里的教授没有一个

对我有重大影响, 听狄尔泰和西美尔教授的课所给我的激励和帮助就更具有决定意义了。狄尔泰的影响主要在于激起对文化史联系的兴趣, 西美尔的影响则在于表明了社会学方法和文化具体化的可能性。此外, 麦克斯·韦伯的方法论著作对我起了澄清问题和开拓思路的作用。”^{[5]206} 卢卡奇的生命客观化思想当然也讨论了劳动分工等马克思主义常见的主题, 似乎包含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视角, 但这种社会视角仍是经新康德主义改造的马克思思想。在早期的艺术审美理论阶段, 对卢卡奇而言, 新康德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加重要。卢卡奇回忆道: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和麦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著作是我的‘文学社会学’的榜样, 在那里, 那些出自马克思的成分必然黯淡无光, 虽然还存在, 但是已几乎难以辨认。”^{[5]211} 与“生命的客观化”的理论不同,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阐述的物化思想, 其核心在于“合理化原则”。资本主义社会在法律、科层制管理、新闻舆论、家庭等领域展现出来的合理化原则, 本质上都是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塑造的, 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则始终以物化的形式呈现。

尽管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思想使用了马克思的商品经济价值理论, 但新康德主义对其的影响同样非常明显。他在 1924 年所写的《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自我批评》中明确承认, 该书理论“对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作出愈来愈大的让步: 战前帝国主义时代接受西美尔的影响, 战后时代接受狄尔泰的哲学、现象学等”, 这本书的问题在于“用资产阶级哲学的时髦唯心主义流派代替唯物主义的认知理论, 先是康德主义(伯恩施坦、麦克斯·阿德勒)、马赫主义(弗里德里希·阿德勒), 后来是黑格尔主义(齐格弗里·马尔克)”^{[5]219}的情况。日本学者初见基也认为, 该书的物化思想与卢卡奇早年艺术审美理论中的“生命的客观化”理论存在关联^{[6]44-45}。

需要注意的是, 狄尔泰的“生命的客观化”概念、西美尔有关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互相对立的观点, 以及韦伯关于“合理化”的讨论, 这三种新康德主义并非以单一独立的思想资源形式融入卢卡奇的物化思想体系。事实上, 卢卡奇在其青年时代既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影响, 同时也接受

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一开始,这三种新康德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便以相互交织的方式,共同对青年卢卡奇产生了影响。

二、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物化思想中的西美尔因素

卢卡奇早期作品中的物化观念,明显受到西美尔对现代商品经济批判的影响^{[7]10},西美尔也是影响卢卡奇物化思想形成的第一个哲学家。西美尔认为,18世纪的市民社会建立在主观文化基础上,而到了19世纪,市民社会走向解体,主观文化被独立的客观文化所取代。主观文化尊重个人的主体地位,可在客观文化中,人的地位被货币取代。这种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分离现象,是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所带来的高度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6]45-46}。

文化本是由人创造,理应为人服务,但在货币的介入与操纵下,文化逐渐摆脱了人的掌控,演变成一股压迫人的外在力量。西美尔提出,货币经济促使社会生活理性化,一切活动被量化为可计算的流程,“货币经济从自身出发产生了在日常交往中进行不间断的数学运算的必要性。许多人的生活充斥了这种估量、衡量、计算、将质值缩减为数量值的活动”^[8],“现代人们用以对付世界,用以调整其内在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称作为算计(rechnende/calculative)功能”^{[9]358}。陈戎女曾总结西美尔提出的资本主义理性化原则:“货币是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的基本条件。理性主义遂成为社会行为、经济行为和个体行为的行为准则,进一步加深了现代生活各方面的价值和结构的现代性转化。”^{[9]10}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客观文化的独立性愈发凸显,其发展态势愈加强劲,最终形成了一股足以压制主观文化的强大力量。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压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生活的目的被错误地等同于手段,致使诸多原本仅作为手段存在的事物,被误当作目的来看待。与此同时,文化所产生的客观产品,依照纯粹客观的规律独立自主地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完全脱离了主体文化的影响,而且客观文化及其产品的发展速度极为迅猛,早已远远超出了主体文化的发展进程。

西美尔还将主客观文化的对立冲突的原因归

结为劳动分工,并从生产和消费两个层面对其展开了论述。其一,在生产方面,传统的生产方式以劳动者自身的形象为塑造对象,通过劳动者将自我投射到产品中来完成生产,由此产生的产品具有统一性,蕴含着生产者的精神性,有助于维系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然而,随着劳动分工的加剧,大规模专门化生产削弱了劳动者与产品之间的精神联系。产品不再体现生产者的个性与情感(意义不再源于其内心),丧失了内在的精神性特征;其意义越来越依赖于与其他产品及其关系的建构。劳动者在产品中难以找到自我投射的影子,产品也逐渐成为了劳动者存在的片面的组成部分,对人的完整性漠不关心。其二,劳动分工还导致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者与自身劳动的分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由资本家提供、组织和分配,劳动者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直接掌控。劳动者的劳动只有在产品进入交换领域后才能保留在其中,一旦无法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劳动者的劳动便与劳动者本人无关,变成了客观存在,成为了货币的客观等价物。劳动产品具有明确的自主性和运动规律,生产者与其相当陌生,劳动者想要拥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只能通过购买的方式。在消费方面,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消费扩大伴随着生产的专门化,因为劳动产品越是客观化、普遍化、缺乏个性,就越适合更多的消费者。

卢卡奇在其自传中承认,西美尔的哲学是其《现代戏剧发展史》的哲学基础^{[5]66}。在他看来,劳动分工导致劳动变得客观化、非个性化,劳动者在这种客观化劳动中无法实现自我表达,只能在劳动之外寻找实现个体性的途径,这正是《现代戏剧发展史》中反复提到的“生命的客观化”现象。商品经济确实已经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深刻重塑了人际交往、价值评判与大众观念,文化观念与商品经济彼此交融,相互支持,呈现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卢卡奇完全接受西美尔对这种物化现象的描述,但同时指出,西美尔对物化意识形态的分析仍然停留在分析物化的直接性和商品交换逻辑上,没有洞察到交换、消费等彰显商品经济文化的背后,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才是支撑商品经济运转的根基。为此,他批评西美尔及当时文化

研究者对文化的研究“就是围绕着物化的外部表现形式兜圈子”^{[10]163}。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 延续了《现代戏剧发展史》中对西美尔物化观念的既继承又批评的态度。在西美尔看来, 异化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异化可以理解为“现代性自身的一个条件, 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属性”^{[11]65}。在马克思《资本论》中, 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是从低到高的三个拜物教序列, 马克思的研究重点完全放在资本拜物教上。然而,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并没有从资本拜物教出发, 而是从商品拜物教切入。他把商品拜物教问题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 认为只有商品形式具备普遍性之后才会产生物化, 并把物化与商品拜物教紧密联系在一起。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这种偏离与他对西美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物化现象的批评密切相关, 他甚至隐晦地批评了马克思的生产力主义, 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束缚了劳动者, 使其丧失了主观能动性^{[17]273-275}。基于此, 卢卡奇提出了有别于马克思的物化理论, 强调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的主体性, 形成了一种重视无产阶级主动性的物化观。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批判西美尔的物化直接性: 西美尔等资产阶级思想家虽然意识到物化现象的存在, 及其对人性的破坏作用, 但始终停留在对物化直接性的表面分析上, 往往将物化的表现形式从其资本主义根源中剥离出来, 将其抽象为一种普遍化、非历史性的人类关系类型, 并使之永久化, 这导致他们不能揭示物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深层联系。他说: “这种倾向最明显地表现在西美尔所写的细节十分有趣和感觉敏锐的著作《货币哲学》里。”^{[10]163} 他称赞西美尔对物化现象的描述“十分有趣”“感觉敏锐”, 这意味着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讨论的物化现象, 本质上与西美尔一脉相承, 二者的差异仅在于对物化现象的归因不同。应该说, 卢卡奇并不否定西美尔将物化归因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观点, 只是认为这种归因还不够深入, 还应该进一步将货币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逻辑联系起来, 唯有如此, 才能超越单纯的现象描述, 摆脱围绕物化的客观文化兜圈子的局限, 这正是卢卡奇在西美尔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思考。

卢卡奇认为劳动是在主体和客体的结构中展开的, 这一观点显然吸收了西美尔思想中关于客观文化的内容。在他看来, 将历史进程中的劳动分工置于主客体结构中审视, 意味着在劳动对象的层次上, 劳动对象被不断地分解, 即劳动对象的专门化。这一过程使得劳动对象之间原本存在的根本质的差异逐渐消解, 在形式上趋于相同。当劳动对象能够转化为无质的差异的相同内容时, 与劳动对象相关的劳动本身可以被规定为相似的或是相同的存在, 尤其在机器作为中介的作用下, 劳动过程会走向机械化, 工人之间的区别也随之消失。

西美尔的思想存在明显缺陷, 卢卡奇也将他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进行了重点批评, 这表明他对西美尔思想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自笛卡尔至 20 世纪 20 年代,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始终缺乏“中介”范畴, 其思想深陷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社会等二律背反之中, 却将这些矛盾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予以接受, 甚至将其抬高为永恒的自然规律或文化价值。在众多思想家中, 卢卡奇单独挑选西美尔当作代表来阐释这个问题。他引述道: “例如西美尔就关于物化的意识形态结构这样说: ‘所以, 既然这些相反的倾向已经产生了, 就让它们去努力追求一种绝对明确地相分离的理想; 随着生活的全部内容变得越来越带物质性的和非人格化, 生活的没有被物化的其余部分则可能变得更加人格化, 更加无可争辩地变成我自己的。’”^{[10]246} 卢卡奇吸收了西美尔重视人的主观性因素的思想, 将人的主观性与阶级意识问题结合起来, 提出了用无产阶级意识取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主客体二分的思路。卢卡奇说道: “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 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 行为的主体, 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10]236}

卢卡奇后来的研究重心转向马克思主义, 但批判西美尔的行为仍贯穿其思想终身。这种持续不断的批判, 也反向体现出西美尔哲学在卢卡奇思想根基处的重要影响力。如杰姆逊观察到, 1963 年《审美特性》一书再版时, 卢卡奇已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有所回撤, 重新回归早年信奉的新康德主义^{[12]162}: “早期的卢卡奇(无论是《小说理论》

还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卢卡奇)被用来诋毁后来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实际上,最终的卢卡奇,他回归到最初的起点,必然让人联想到整个事业的失败和虚无。”^{[12]163}杰姆逊以连续性视角审视卢卡奇一生的思想,认为其思想是一个逐步探索与扩展的过程,早期与后期思想相互映照,共同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三、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思想对韦伯合理化思想的接受

如果说西美尔为卢卡奇提供了物化批判的文化视角,那么马克斯·韦伯则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学分析工具。相较于西美尔对卢卡奇的影响,韦伯对其物化思想的影响虽来得稍晚,却更为深刻且持久。如果说卢卡奇对西美尔始终持批判态度,那么他对韦伯的态度则始终温和有礼。1912年至1915年间,卢卡奇频繁出席韦伯夫妇在海德堡举办的星期天沙龙。正如匈牙利文化研究专家玛丽·格鲁克所言:“在他后来的所有回忆中,对韦伯充满了温暖和感激,尽管韦伯具备比卢卡奇和他的朋友们更古老、更严肃、更理性的传统,但似乎从来没有成为西美尔、狄尔泰甚至尼采的那种嘲笑和失望的对象。”^{[13]150}如果说卢卡奇认为西美尔对物化现象的描述仅是“十分有趣”和“敏锐”,那么在他看来,韦伯对物化现象中合理化的描述则显得非常严肃且深刻。

卢卡奇与马克思都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但他们之间存在根本性的视角差异,这源于卢卡奇深受韦伯的影响。马克思的批判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旨在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矛盾,论证其必然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规律。而卢卡奇则深受韦伯合理化原则的影响,将批判的焦点从经济系统的客观矛盾,转向了资本主义理性化进程对人的主体性造成的全面物化效应。他创造性地将韦伯的批判工具融入马克思主义框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深层生存论批判。具体而言,卢卡奇对韦伯思想的吸收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在物化理论的核心批判概念上,卢卡奇将韦伯的合理化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相衔接,以阐释物化意识的生成机制。

首先,在对合理化的理解上,卢卡奇直接采

纳了韦伯的“计算”与“可计算性”作为理解理性化的核心,并根据韦伯的方法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他说道:“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10]155}为论证这一观点,卢卡奇长篇引用了韦伯关于企业、法院中“合理地计算”的论述:“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在内部首先建立在计算的基础上,为了它的生存,它需要一种法律机构和管理系统,它们的职能至少在原则上能够根据固定的一般规则被合理地计算出来。”^{[10]164}卢卡奇评论韦伯的这种观点是“十分正确地补充了有关这种现象的原因和社会意义的分析”^{[10]164}。对劳动过程中马克思提到的机械性的物化劳动,卢卡奇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指出劳动过程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工人被简化为执行“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10]154}。但对于机械性劳动的分析,他就启用了韦伯关于时间从古代的体验性的质的时间转向现代可以测量的量化时间的思想,在这种视野下,现代的时间失去了质的、流动的性质,“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10]157}。

其次,物化也出现在制度层面上,卢卡奇几乎全盘借鉴了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将官僚制视为物化在政治与法律领域的集中体现。他援引韦伯的论述,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需要一套能够“根据固定的一般规则被合理地计算出来”^{[10]164}的法律与管理系统。卢卡奇的分析表明,法律和国家的“形式上的合理化”并非单纯的上层建筑,其本身就是一个将社会职能分解并纳入非人化规则系统的过程,是物化意识的再生产机制。他敏锐地洞察到,“官僚统治意味着使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以及意识……适应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前提”,从而使主体沦为被动的观察者^{[10]167}。

最后,在世界图景的理性化上,卢卡奇受到韦伯“世界祛魅”思想的启发,提出了所谓世界图景的物化实际是“第二自然”概念。韦伯认为合理化进程消除了世界的神秘性与内在意义,导致一个客观、可计算但意义空洞的“铁笼”的出现。卢卡奇的“第二自然”概念与此直接呼应,它描述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通过商品交换与合理化

制度建构的物化结构, 被人们当作如同自然界规律一般既定的、不可更改的秩序来接受。这使得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获得了一种“自然”的假象, 从而深刻地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形成。

第二, 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创造性地吸收了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阶级意识理论。

卢卡奇在构建其阶级意识理论时, 表现出对韦伯方法论的高度认同。他强调, 研究社会意识必须把握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内在关系, 将社会意识理解为“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 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情感等等”^{[10]109}。这种“特定生活状况”总是与整个社会结构相关, 既然社会结构的数量是有限的, 那么“特定生活状况”也是有限的。基于此, 这些“特定的生活状况”就可以区分为几种相互区别的基本类型, 社会意识也就可以相应地区分为几种类型, 阶级意识就是这样被区分开作为类型化的社会意识。

卢卡奇在阐述完阶级意识是类型化的社会意识观点后, 在脚注中明确指出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阶级意识观念与韦伯的“理想类型”观念存在的密切关联。他指出: “遗憾的是……我更不可能在这儿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类似的企图(如马克思·韦伯的理想典型)之间的关系。”^{[10]109} 这一坦率的表述清晰地表明, 卢卡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意识概念, 本质上与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观念相通, 只是因篇幅所限, 未能作进一步阐发。

卢卡奇将阶级意识视作韦伯式的“理想类型”, 是因为他认为阶级意识和“理想类型”一致, 是不能直接感知的现实意识, 而是与特定生产关系相匹配的意识, 是一种“客观可能性”。基于这种理解, 他提出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定义: “阶级意识——从抽象的和形式的方面来看——是关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状态的、被阶级所规定的无意识状态。”^{[6]269} 这一定义充分展现了韦伯思想方法对其有深刻影响。

卢卡奇的这一“阶级意识”概念无疑与马克思、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意识理论有着明显差别。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阶级意识是一种“无意识状态”, 相反, 他们强调阶级意识存在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自觉发展过程。卢卡奇

对阶级意识的这种独特理解, 正是他深受韦伯思想方法论影响的结果, 也构成了他物化理论中最具原创性的部分之一。

第三, 在物化的经济基础与物化的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卢卡奇与韦伯保持着高度一致, 这一立场使他与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拉开了距离。

韦伯强烈反对将经济因素视为合理化的唯一根源。在他看来, 将经济因素视为历史文化唯一决定性因素的看法, 是“盛行于不求甚解的人和门外汉的意识中”的教条^[14]。相反, 他将经济合理化置于宗教和文化的背景中, 认为经济合理化思想存在的前提是文化和宗教, 其根源在于文化, 而非经济。这一基本立场深刻影响了卢卡奇物化现象分析框架的构建。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 卢卡奇毫无批判性地引用了韦伯一页半的内容, 以此论证自己关于物化现象“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的观点。这种大段的、不加批判的引用在学术著作中是不寻常的, 其清晰地表明了卢卡奇对韦伯分析框架的高度认同。在讨论法律、国家的物化与经济生活的物化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时, 卢卡奇不再像西美尔那样认为前者完全基于后者, 而是直接默认了韦伯的观点, 认为二者是相互适合的关系。

卢卡奇毫无保留地引用韦伯的思想, 对社会物化的基本原则作了如下描述: “宁可说, 二者在基本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从社会科学上看, 一个‘企业’就是现代的国家, 像一个工厂一样: 这正是它在历史上特有的东西。而企业内部的统治关系, 也处处是一样限定的。手工业者或者家庭手工业者……他们自己拥有工具、储备、资金和武器。借助这些东西, 他们行使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职能。当这种职能完成时, 他们就靠上述那些东西为生……那些为企业和经济生活所必须的工具、储备和资金, 在一种情况下掌握在企业家手里, 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掌握在政治家手里。”^{[10]164}

基于韦伯所揭示的这种结构同源性, 卢卡奇得出结论: “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创造了一种同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在结构上适合于它的结构的法律、一种相应的国家等等。”^{[10]163} 在卢卡奇看来, 经济中的物化与政治法律中的物化“这种结构上的相似性”, 正是韦伯所准确描述的。在这种表述

中,他没有像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者那样认为政治、法律和文化中的物化是受经济物化决定的,而是认为二者平行,只因政治、法律、文化与经济都是人类生活不同领域的物化,彼此“结构上相似”且在存在上“相互适应”。卢卡奇的这种观点既不同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也不同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反而与韦伯的多元因果观保持一致。

正如孙伯鍈教授注意到的那样,青年卢卡奇“生命的客观化”受到韦伯合理化思想的影响,即使当韦伯成为他理论批判的主要对象之后,这一点也没有改变^[15]。哈贝马斯也提到,虽然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和合理化概念在结论上反对韦伯,他认为韦伯颠倒了经济中的合理化与文化上的合理性的因果关系,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本身是以韦伯的分析为基础的,他完全接受了韦伯关于社会合理化过程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性意义的观点^[16]。

由于卢卡奇与韦伯的交往发生在西美尔对其早期文艺审美研究的影响期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写作期之间,因此有学者认为韦伯的影响是卢卡奇从“西美尔式的物化观过渡到《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概念”的“特殊的中间环节”^[17]。他们说:“‘物化’理论将韦伯的思想因素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统之中,构成对马克思思想的补充”^{[17]45}，“韦伯的现代性研究服务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主题,从本质上讲韦伯只是通达马克思这一目的的途径与手段。”^{[17]46}这些学者固然合理地看到了韦伯因素在卢卡奇思想中的地位,但他们仍然将卢卡奇首先定位为马克思主义者,然后把韦伯仅仅当作卢卡奇通达马克思的手段,这是一种不合适的目的论。事实上,卢卡奇是深受韦伯等人的影响才去接触马克思的著作的(如《资本论》)。他明确表示:1908年前后,为了给《现代戏剧发展史》奠定社会理论基础,“引起我兴趣的是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我通过由西美尔和麦克斯·韦伯决定的方法论眼镜去观察他”^{[10]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再次研究马克思思想,同时也在研究韦伯思想和黑格尔主义。也就是说,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发表之前,他并没有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阶段”。既然卢卡奇当时头脑中根本没有马克思的

地位,那么马克思的思想怎么可能成为卢卡奇确立马克思主义信念的手段呢?

四、新康德主义“前见”与卢卡奇对马克思的重构

关于新康德主义与卢卡奇思想的关系,事实上学术界已经有不少讨论。有些学者认为,新康德主义在卢卡奇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最后卢卡奇还是放弃了它,也就是说,它只不过是卢卡奇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块跳板而已。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前面有关《历史与阶级意识》与西美尔和韦伯思想之间紧密关联的论述,就可以作为证据以否定这种“跳板说”。国内学者如周凡等教授也有这方面的看法,这种观点最具代表性的还是日本卢卡奇专家初见基,他指出:“卢卡奇因袭了新康德主义等关于自然科学的认识和人与人之间的实践关系存在着严格的界限的思想观点,新康德主义被置于卢卡奇思想体系中。”^{[6]263}然而,前文论述已经证明,西美尔和韦伯等对卢卡奇思想的影响,远远不仅局限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存在界限如此简单的问题上,而且初见基所谓的“新康德主义被置于卢卡奇思想体系中”的“被置于……之中”的意思并不明朗,其他学者所论述的“卢卡奇思想包含新康德主义因素”的“包含”的具体性质也过于模糊。事实上,卢卡奇物化思想中的新康德主义因素远不是前者“包含”后者那么简单,在我们看来,新康德主义并不是单纯以“因素”的方式被包裹在卢卡奇物化理论中,更重要的是,新康德主义是以理论前见、以问题域的方式决定着卢卡奇对马克思思想的接受与偏离,可以说,其决定着卢卡奇对马克思思想重构的最基本特征。

(一)被淡化的客观规律:从经济危机机制到意识辩证法

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必然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资本积累导致的普遍贫困化与生产过剩,这些如同自然规律般客观的经济运动,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物质基础。经济危机在马克思这里,是系统自我否定的客观证明。然而,在卢卡奇的笔下,这一核心主题被显著地淡化了。

他并非不知晓危机, 而是转变了理论重心。在讨论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时, 卢卡奇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立场: “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积累在经济上的不可能性并不表现为, 随着对最后一个非资本主义生产者的剥夺, 资本主义就‘停止’了, 而是表现为一些迫使资本家阶级认识到这种形势正在来临(虽然从经济上看还比较遥远)的行动, 这些行动就是: 狂热地开拓殖民地、争夺原料和市场、帝国主义和世界战争等等。”^{[10]280}

这段论述清晰地表明, 卢卡奇所关心的并非是危机作为经济系统客观的、自动的崩溃机制。他关注的是一种“发展的倾向”如何主观地反映在资产阶级的集体心理与行动逻辑之中, 并驱使它们采取帝国主义和战争等历史行为。对他而言, 危机的经济规律本身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种规律作为一种“迫近的意识”如何成为实践行动的驱动力。于是, 马克思的经济学危机理论, 在卢卡奇这里被巧妙地转换成了一个意识与行动的辩证法问题, 革命的客观前提在很大程度上被革命的主观条件——阶级意识的成熟——所覆盖。

(二)概念的混淆: 将“物化”等同于“对象化”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其思想的核心, 也是最可能引起马克思异议的地方, 因为他混淆了“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与“物化/异化”(Entfremdung)。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中, 马克思从更一般的层面定义了劳动过程, 其中也蕴含了对象化的思想: “在劳动过程中, 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 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 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 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 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18]211} 劳动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对象化”过程, 就是指动的劳动(活动)转化为静的产品(存在)。马克思特别强调, 这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在这里, 对象化与人类的生存和创造直接同一, 是积极的、构成性的活动。

既然马克思本人严格区分了中性的“对象化”和批判性的“物化/异化”, 那么卢卡奇的问题出

在哪里就很清楚了。卢卡奇并非不知道“对象化”这个词, 而是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理论框架内, 未能成功地将“对象化”的普遍范畴与“物化”的特殊历史形式在结构上区分开来。当卢卡奇写下: “因为主体性和客体性之间的分裂恰恰是发生在把自己客体化为商品的人的身上, 正因此, 他的这种地位就变得可以被意识到了。”^{[10]260} 他的核心洞见在于: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对象化的普遍过程, 采取了“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特殊的、物化的形式。由于卢卡奇急于构建一个总体性的物化批判理论, 并将批判的焦点集中于“主客体分裂”这一意识哲学的核心问题, 导致他在行文和理论推演中, 将“对象化在商品形式中”这一历史现象几乎等同于对象化本身。然而, 在马克思看来, 问题绝不在于对象化本身, 也不在于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被出卖(这是一种社会形式), 而在于这种社会形式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即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导致了系统的剥削和奴役。卢卡奇的表述模糊了这一关键界限, 仿佛任何对象化(在这里即劳动力成为商品)本身就直接是物化/异化。这使得他的批判带有一种普遍人类学困境的色彩——似乎人与外部世界的任何对象性关系都潜藏着物化的悲剧。相比之下, 马克思的批判始终坚定地指向一个特定的、历史的社会经济结构, 其目的在于通过改变这个结构来解放对象化劳动, 而非取消对象化劳动本身。

(三)重心的转移: 从社会经济结构到意识哲学

这一差异在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表面上, 卢卡奇完全继承了马克思的论述, 但二人的理论重心却有本质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旨在揭示一种客观的、社会性的错觉。他雄辩地论证了在商品形式中, 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神秘地掩盖, 并以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虚幻形式呈现出来。这是一种独立于个人意识的、由商品价值形式本身必然产生的客观现象, 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幽灵般的对象性”^{[18]51}。卢卡奇完全接受了这一分析, 但他立刻将之引向一个不同的方向。在阐述了商品拜物教之后, 他立即转向并定义了物化意识的普遍性: “但因此, 直接性及其方法论结果, 即主体和客体僵硬的对立, 也还没有完全得到克服。”

紧接着,他提出了解决之道:“只有当工人意识到他自己是商品时,他才能意识到他的社会存在……只要他实际上还不能够使自己超过这种客体地位,他的意识就是商品的自我意识;或者换言之,就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揭露。”^{[10]261}这意味着,卢卡奇从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客观理论,迅速跃升为关于意识结构和认识能力的哲学理论。马克思的核心问题是“商品形式如何神秘地掩盖了社会关系的本质”,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发问;而卢卡奇的核心问题则演变为“这种神秘化如何塑造了我们整个世界的经验和思想,我们如何才能从意识上摆脱它”,这是一个文化批判与意识哲学的发问。他将马克思对客观经济结构的科学分析,重构为无产阶级寻求主观意识解放的哲学指南。

新康德主义是卢卡奇的问题域,卢卡奇的问题域无疑不同于马克思创作时期的问题域,这种问题域确定了卢卡奇和马克思的思想存在上述偏离。但“问题”并非“答案”,卢卡奇拥有新康德主义的问题域并不意味着他要接受新康德主义的答案,而意味着他可以利用新康德主义的提问来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答案”。卢卡奇敏锐地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深刻分析,正是对韦伯合理化和西美尔货币哲学所描述现象的最彻底的社会经济根源揭示。他将文化哲学的焦虑,成功地转译并锚定到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框架之中。正是通过对问题域的重新转换,卢卡奇用马克思的“历史性”克服了韦伯的“铁笼”。韦伯的合理化过程带有不可逆转的悲观色彩,现代人似乎注定要在这个“铁笼”中苟活。尽管卢卡奇对韦伯的态度温和,未作言辞激烈的批判,但是韦伯在世时对资产阶级的颓废全然漠视,完全不进行批判^{[19]313},这种犬儒态度让卢卡奇非常难以理解。韦伯的妻子玛丽安妮·韦伯注意到,青年卢卡奇渴望超越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力图摆脱新康德主义哲学那种单纯否定和分析的特征,并推动有机文化取代个体主义破碎的局面^{[13]150}。卢卡奇从马克思那里引入了“总体性”(Totalität)和“历史辩证法”,指出物化不是超历史的永恒命运,而是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无产阶级一旦获得“总体性意识”,就能看穿物化表

象的假象,认识到自己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与创造者,即历史的同一的主客体,从而在实践中打破这个“铁笼”。安德鲁·芬伯格指出,卢卡奇利用马克思主义对韦伯思想进行了重新塑造,“卢卡奇在马克思的模式下重塑了韦伯的理论,从而逆转了其原本的总体趋势:不再仅仅描述合理化‘铁笼’的无情推进,卢卡奇翻新的韦伯主义将这种趋势与一种辩证的、旨在最终从异化社会法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反趋势并置起来”^[19]。

综上所述,由西美尔和韦伯塑造的“思想前见”,决定了卢卡奇解读马克思的独特路径,使他聚焦于物化意识、主客体分裂等被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哲学-文化维度。这一重构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马克思思想中某些“坚硬”部分(如客观经济规律、对象化与物化/异化的严格区分)的过滤与偏移。当然,这种“偏离”成就了卢卡奇的独创性。没有西美尔和韦伯思想的“前见”,卢卡奇或许不会以“物化意识”为核心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转向或许会推迟许久;而没有马克思解决方案的影响,他则无法为这一主题找到历史的、实践的出路,最终只能陷入其先辈的悲观论调中。卢卡奇的成功,正在于他将新康德主义的“问题域”与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之间进行了创造性结合,从而为二十世纪的批判理论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也奠定了自己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不朽地位。

参考文献:

- [1] 张双利.从韦伯到马克思:再论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批判[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0(1):266-288.
- [2] 吴一帆,黄学胜.从新康德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青年卢卡奇政治伦理思想的嬗变[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1(1):233-250.
- [3] 张秀琴.论卢卡奇“物象化”(Versachlichung)概念的源起:以《现代戏剧发展史》为例[J].现代哲学,2021(1):19-25.
- [4] LUKÁCS G. A Modern drama: fejlődésének története[M]. Budapest: Kiszfaludy Társaság, 1911: 146-147.
- [5]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M].李渚青,莫立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 [6] 初见基.卢卡奇:物象化[M].范景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下转第63页)